



# 谈“团结-批评-团结”



0768

夏禹龍 薛 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380.7  
370

談“團結——批評——團結”

夏禹龍、薛敏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萬石里1號

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公私合營聯印印刷廠印刷 · 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1/8 字數27,000

1957年9月第一版

1957年1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2,091—19,100

統一書號：3103·52

定價：(6)一角一分

11

## 目 錄

|     |                                                |    |
|-----|------------------------------------------------|----|
| 一   | “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是馬克思列寧主義<br>關於人民內部團結學說的新發展..... | 2  |
|     | 理論依據.....                                      | 2  |
|     | 歷史教訓.....                                      | 4  |
|     | 在黨內的確立.....                                    | 6  |
|     | 在黨外的應用.....                                    | 8  |
| 二   | “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 11 |
|     |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 11 |
|     | 兩種不同的解決方法.....                                 | 12 |
|     | 兩種不同的錯誤傾向.....                                 | 14 |
| 三   | 正確認識和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                    | 16 |
|     | 從團結的願望出發.....                                  | 16 |
|     | 開展恰如其分的批評和鬥爭.....                              | 20 |
|     | 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 27 |
|     | 誠懇地歡迎善意的批評.....                                | 28 |
|     | 認真地進行自我批評.....                                 | 31 |
|     | 切實地改正缺點和錯誤.....                                | 33 |
| 后 記 | .....                                          | 36 |

## 一 “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是馬克思

### 列寧主義關於人民內部團結學說的新發展

“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是我們黨提出來的，它的意思是說，爲了解決同志間的矛盾和分歧，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當然，這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運用和發展。現在就來談談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這個問題的學說。

#### 理 論 依 據

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是資本主義還在上升和發展的時代，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還在幼年的時代。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在思想上理論上爲無產階級確立和準備好了一套完整的體系；另一方面，把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替無產階級建立了獨立的組織，鍛煉和教育無產階級，準備將來進行革命鬥爭。他們建立了第一國際，在以后又組織了第二國際和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著名口號。同時，爲了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必須同無產階級內部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宗派進行鬥爭。馬克思在給弗·波爾特的信中寫着：“……國際（注：指第一國際）成立的目的是要工人階級具有真正組織去進行鬥爭，以代替各種社會主義的和半社會主義的宗派。”（“馬克思恩格斯文

選”（兩卷集），莫斯科版，第2卷，第465頁）這些，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內部團結和鬥爭的重要指示。但是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沒有來得及對這個問題作更詳盡的論述。

到了第二國際的時代，各國社會民主黨進行了廣泛的組織工作，工人階級在組織上是獲得很大成功的。可是當時正處于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組織，不是怎樣嚴密統一，黨同工會之間的區別也不明顯，缺乏戰鬥力。尤其從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後，第二國際在考茨基領導下，對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完全採取調和的態度，使機會主義腐蝕了第二國際各國的黨。這種黨，一到帝國主義時代，就暴露出它不能擔負無產階級在新時期中的革命任務，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不得不走向破產和沒落。

列寧的時代和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不同，這是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快要死亡的時代，也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個時代要求無產階級建立堅強的、戰鬥的政黨。然而，正在帝國主義大戰迫近，無產階級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迫近的時候，在第二國際下的各國社會民主黨，還沒有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覺悟，還不願意也不敢去發動無產階級的革命進攻。同時，它們在組織上也是散漫的和有派別分歧的，主張黨的組織上的自由主義，主張黨內不要嚴密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主張無原則的黨內和平，等等。

列寧在這樣的情況下，爲了建設一個能夠勝任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統一和鞏固的政黨，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去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更不能不反對它們在黨的組織上的自由主義。正因爲列寧的建黨學說是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所以在他的建黨學說中，也就充分反映



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特點，充分反映了反對不要嚴格的組織和紀律，反對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反對不要黨內思想鬥爭和害怕自我批評，反對自由主義、調和主義等特點。1921年，列寧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強調說：“……我們需要團結、堅定與紀律，——這不僅是因為，沒有這些，則無產階級的黨就不可能親睦地工作，而且是因為……如果沒有最高度的團結，則我們更不能有所行動了。”（“列寧文集”，第7冊，第82頁）列寧在為這次代表大會起草的“關於黨內統一的決議草案”中更進一步指出：“代表大會為了實現黨內和蘇維埃全部工作中的嚴格紀律，並在取締一切小組組織問題上達到最大限度的統一起見，決議由中央委員會來全權處理：凡遇有破壞紀律，復活小組組織或縱容小組組織的情形，即採取黨內一切懲罰辦法，直到開除黨籍為止。”（“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版，第2卷，第823頁）

### 歷 史 教 訓

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具體條件，和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時候的條件，是大不相同的。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沒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工人貴族階層；工人階級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下，沒有絲毫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利，更加談不上進行合法的議會鬥爭，所以，社會改良主義思想在工人運動中找不到市場。而且，我們黨的建立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一開始就接受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優良傳統，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下，按照列寧的原則辦事，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都沒有受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影響。這使得我們的黨，從最初組織起，就是一個完全新型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就確立了民主集中制，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鬥爭，就有嚴格的組織和紀律，就能夠對自由主義、經濟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不

良傾向進行嚴格的批判。這是一個方面。

但是，還有另一個方面。由于我國的經濟落后，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是個汪洋大海，這個階級出身的同志在黨內也佔了相當大的比重；而小資產階級在思想方法上本來就有着主觀性和片面性，處於中國革命的異常艱苦和殘酷的斗爭環境中，很容易產生偏激情緒，因此，使得不少同志常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犯了另一個錯誤，那就是過火的黨內斗爭。這些同志機械地錯誤地理解列寧的原則，生硬地搬用這些原則。他們強調組織上高度集中，否定黨內民主；強調黨內斗爭，否定黨內和平；強調統一的鐵的紀律，否定黨員的個性和黨員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等等。這樣的結果，就會傷害同志，破壞團結，甚至給黨帶來嚴重的損失。

我們黨在1934年以前，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和反對李立三同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這些斗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進行這些斗爭時，過多地追究了犯錯誤的人的個人責任，簡單地給他們以組織上的處分，並沒有徹底弄清錯誤的實質和它的根源，因而不可能幫助黨的干部提高覺悟水平。特別是在反對立三路線的斗爭中，以王明、博古等同志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不是用正確的態度和方法來進行黨內斗爭，而是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立場來進行反對黨中央的活動，並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使新的“左”傾路線取得了對全黨的統治。

此后，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統治下，宗派主義的錯誤不僅沒有克服，反而發展到了黨的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們完全破壞了黨內的民主制度，發展了過火的黨內斗爭，把這種過火的黨內斗爭作為提高威信、嚇唬干部、推動工作的一種經常辦法。如果有同志由于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採取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或不堅決執行的，就要一律扣上“右傾機會

主義”、“富農路線”、“兩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甚至以對罪犯和敵人作鬥爭的方式來進行這種“黨內鬥爭”。更可痛心的是，很多地區，還把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以致造成對大批優秀的同志的誣害。這種宗派主義統治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它發展了黨內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傾向，打擊和阻撓了黨內新鮮活潑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造成了黨內上下脫節和其他許多不正常現象，極大地削弱了黨。

### 在黨內的確立

對於上述嚴重的宗派主義錯誤，黨內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是進行了長期的鬥爭的。在這個鬥爭中，逐步形成和發展了“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

1929年12月毛澤東同志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寫的決議中，正確地指出了糾正黨內的各種錯誤思想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的重大意義，指出了“……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份所構成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89頁），同時，指出了黨內鬥爭的目的“……是增加黨的戰鬥力以達到階級鬥爭的勝利，不應當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同上，第94頁）這樣，就為我們黨確立了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

1935年1月黨中央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全黨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以後，黨內鬥爭得以在正確的方針下健康地進行。

在長征過程中，在紅四方面軍中工作的張國燾進行了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惡活動。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同志本着“治病救人、與人為善”的精神，仍一貫地對他進行了從團結願望出發的



批評和鬥爭。雖然張國燾最後還是拒絕了黨的挽救，只身逃出延安，去當國民黨的特務了，但是紅四方面軍的絕大多數干部都很快地覺悟過來，回到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挫敗了叛徒張國燾的分裂陰謀。這是黨中央執行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的一次重大勝利。

對於在1931年到1934年期間犯嚴重路線錯誤的同志，黨中央並沒有給以嚴重的懲辦，仍然分配他們以適當的領導職務，耐心地等待和幫助他們從思想上真正地認識自己的錯誤。

1942年，我們黨發動了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整風運動。這是五四時期以後又一次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運動，也是全黨範圍內一次大規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必須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也就是“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在這個正確的方針下，全黨干部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詳細地檢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檢查了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領導，展開了深刻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就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水平和對於黨內是非的辨別能力，達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與此同時，黨中央政治局曾經幾次進行了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後，又在1943年到1944年這個時期內，領導全黨高級干部進行同樣的討論。1945年4月舉行了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擴大），在黨的干部包括絕大多數犯錯誤的同志思想一致的基礎上，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1931年到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作了詳細的結論。這一系列的措施，為1945年4月召開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重要的準備，使那次大會達到了中國共產黨空前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黨內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進行了以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為目的的陰謀活

動，並在1953年形成了反黨聯盟。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發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中提出了在對待黨內錯誤上採取分別對待的方針：對於那種有意破壞團結、向黨對抗、堅持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進行無情的鬥爭，給以嚴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但是對於那種具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或犯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錯誤的同志，或者對於那種雖然具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缺點、犯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錯誤，但在受到批評教育以後，仍能將黨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願意改正並實行改正的同志，應當採取“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方針。這個決議連同黨中央揭露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的事實向全國各級黨組織進行傳達以後，全黨的團結和統一進一步鞏固了。

1956年9月舉行了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系統地總結了三十五年來黨內鬥爭的基本經驗，指出了克服思想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是保證黨的工作順利發展、避免重大錯誤的根本關鍵，而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採取正確的態度，又是黨的正確領導的必要條件之一。經過這次大會的傳達和討論，全黨同志對於“團結——批評——團結”的正確方針的認識和運用，達到更加自覺的地步。

### 在黨外的應用

“團結——批評——團結”這一公式，不僅適用於黨內，而且適用於黨外。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羣衆，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採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採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列寧曾經指出：“職工會的主要行動方法是說服和教育”（“新經濟政策下職工會底作用與任務”，“列寧文選”（兩卷

集），莫斯科版，第2卷，第927頁）；他在講到農民時說：“……這種人是不可驅逐，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和睦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並且只有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方面的工作，才能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版，第2卷，第711頁）

早在1927年，我們黨在南方的革命根据地中，關於處理黨羣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以及其他人民內部關係，就在實際上已經採用了“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黨依靠羣衆，羣衆接受黨的領導；軍隊要做羣衆工作，羣衆又支持軍隊；軍隊內部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官兵平等，……這些原則的實施，對於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据地起了重大的作用。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把“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礎上。在處理外來幹部同本地幹部之間、軍隊工作幹部同地方工作幹部之間、老干部同新幹部之間以及几部分軍隊之間、几个地方之間、几个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上，都是採取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的原則，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爲了加強黨政軍民的團結，各抗日根据地都開展了軍隊的擁政愛民運動和民衆的擁軍優抗運動。通過拜年、聯歡、座談、訂立公約等方式，相互支持，相互慰問，各自檢查過去的缺點錯誤，實行公開的羣衆性的自我批評，切實地在行動中加以改正，真正做到軍民親密團結如一家人。同時，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我們採取了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也就是“團結——批評——團結”的政策。對於頑固勢力，也就是以蔣介石爲首的買辦封建勢力，在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聯合，在堅決反共的方面加以孤立。對於中間勢力，也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在要求抗日民主的方面加以團結，在對頑固勢力鬥爭中表現動搖的方面加以適當的說服和

批評。由于這樣，我們能夠在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基礎上，保持同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中間勢力和頑固勢力的統一戰綫，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投降反共的陰謀，削弱了國民黨反動力量，壯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以蔣介石爲首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背信棄義，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在革命戰爭中，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繼續採取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說服他們拋棄了對於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中，我們仍然對他們採取了“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

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以后，社會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已經退居次要地位，而人民內部的矛盾就顯得更爲突出了。在這樣的形勢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爲當前國內生活中的新的重大的課題。現在，我們就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1957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其中對於划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綫，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都有了極其精闢的論述。這些論述，值得我們每個人反覆的學習和體會，以便在實踐中能夠很好地加以運用。

根据上面所說，“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是我們黨反對宗派主義、加強黨內外團結的有力武器，是處理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個公式的確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內部團結學說的新發展，不僅對於當前國內生活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有一定的貢獻。

## 二 “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是解決人

### 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里，找到了“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可是，為什麼這個公式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呢？爲了從理論上闡明這個問題，首先要從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談起。

####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衝突。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利害的根本衝突，而是由於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於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也就是說，它們之間雖有着階級利害的衝突，但是，又有着對敵鬥爭利益的一致。

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由於我們黨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各項方

針、政策和具體措施必須通過各級領導者到人民羣衆中去貫徹執行，由于人民羣衆在生產中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受着這些領導者的管理，而且他們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要通過這些領導者才能得到滿足，因此，人民內部的許多矛盾，往往通過人民羣衆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現出來。

### 兩種不同的解決方法

對於不同性質的矛盾，有不同的解決方法。辯證法告訴我們，矛盾有兩重性：既有同一性，又有鬥爭性。處理敵我矛盾，由于敵我之間利害的根本沖突，應該不強調同一性，而強調鬥爭性，使矛盾緊張起來，使鬥爭激烈化，以至于把矛盾的對方打倒或消滅。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由于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應該不強調鬥爭性，而強調同一性，沒有必要使矛盾緊張起來，使鬥爭激烈化，以至于妨礙對敵鬥爭的總的利益。

有人說：“共產黨不是歷來強調鬥爭嗎？爲什麼現在又強調團結呢？”

的確，共產黨是強調鬥爭的，但這是對敵人，因爲客觀上需要用強硬的鬥爭的辦法來解決這樣的矛盾。可是，共產黨決不是鬥爭的嗜好者，如果可以用比較和緩的辦法來解決矛盾，爲什麼一定要人爲地使矛盾緊張起來，使鬥爭激烈化呢？採取什麼辦法來解決矛盾，不是由主觀願望決定的，而是由客觀需要決定的。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我們的國家對誰實行專政呢？是對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誰來行使專政呢？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顯然，專政的制度不適用於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在人民內



都是實行民主集中制。人民有廣泛的自由和民主的權利。

因此，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跟處理敵我矛盾不同，不應該用專政的方法，而應該用民主的方法。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爲一個公式，就叫做“團結——批評——團結”。

“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不僅適用於解決勞動人民內部的矛盾，而且適用於解決人民內部的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除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一個短時期以外，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爲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誕生和發展起來的，形成了它的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參加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的一面，又有在革命鬥爭中搖擺和妥協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擁護人民民主政權、擁護共同綱領和憲法、接受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協助國民經濟恢復、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又有施放“五毒”、反對限制、抗拒改造、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所以，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雖然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爲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所謂處理得當，就是要對民族資產階級正確地貫徹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也就是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就絕對不採取對抗的鬥爭形式了。當着民族資產階級消極的一面抬頭、公然違背共同綱領、向着工人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就有必要開展大張旗鼓的羣衆鬥爭和實行法律制裁，給予他們堅決的回擊，否則，就不能保持工人階級的領導權，不能勝利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社

會主義建設。1950年春的反投機鬥爭和1952年“五反運動”，就是這樣的例子。當然，這種大張旗鼓的羣衆鬥爭和法律制裁，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鬥爭的基本方式，而僅僅是一種補充方式，雖然是不可少的補充方式。並且，只要民族資產階級願意承認錯誤，停止他們向工人階級的猖狂進攻，我們仍然把他們放在人民內部，以繼續團結、改造他們。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生產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是非對抗性的矛盾，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從經濟方面來說，也已經解決了；但是，從意識形態方面來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在這方面還將長期存在嚴重的階級鬥爭。這次，資產階級右派利用“大放大鳴”的機會，向我們黨和工人階級發起猖狂進攻，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 兩種不同的錯誤傾向

目前，我們的社會正處在深刻的歷史性的大變動之中。由於我們對新形勢還缺乏認識，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還缺乏經驗，在處理的方法上就容易產生一些錯誤的傾向。

一種是“左”的傾向。有些人習慣於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習慣於搞大規模的狂風暴雨式的羣衆階級鬥爭，而往往誤用這種方法去處理當前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他們不正視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不願意擴大民主生活，擴大批評和自我批評，而總是喜歡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用粗暴的態度去強制別人服從自己的意見，甚至於對批評者施行打擊報復。採取這種態度和做法，必然會在工作中發展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傾向，造成領導者同人民羣衆之間的隔閡，招致人民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的嚴重損失；在特殊情況下，還可能發展為貴族化和專制主義的傾向，使領導者同人民羣衆嚴重地對立起來，使

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發生某種停滯、硬化的現象，甚至于使人民內部的矛盾有發展為對抗性矛盾的危險。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矛盾，反對用對待敵人的方法去對待人民的錯誤傾向。

另一種是右的傾向。有些人認為，既然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應該用民主的方法：那末就不需要有集中的領導了。他們把民主和集中絕對對立起來，把自由和紀律絕對對立起來，不了解它們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着的側面。他們嚮往于所謂“絕對民主”、“絕對自由”，不了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他們的這種思想，實際上反映了小資產階級自發的無政府主義傾向。這種傾向，是為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所特別歡迎的。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有計劃的集體經濟，這樣的經濟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有嚴格的集中領導。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生產、學習便不能有效地進行，社會秩序便不能有效地維持，整個社會生活便將陷于混亂的狀態。這樣，不會有利于人民，而只會有利于人民的敵人；不會有利于社會主義，而只會有利于資本主義的復辟。所以，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集中，也不可以沒有紀律。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我們必須堅決保衛我們的民主集中制，不讓那些所謂“絕對民主”、“絕對自由”的觀念來侵蝕我們的隊伍，不讓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這種觀念來渙散勞動人民的意志，瓦解勞動人民的組織性和戰鬥性。